

卢日科夫 谈

21 世纪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 范洲萍 / 编写

莫斯科市长尤·卢日科夫在 1998 年 11 月 23 日举行的“21 世纪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21 世纪俄罗斯：繁荣还是停滞”的演讲（载于俄《经济问题》杂志 1998 年第 12 期），对俄罗斯改革中的失误进行了分析，并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道路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俄罗斯改革的最大失误是 没有摸准国情对症下药

毋庸置疑，俄罗斯现行社会经济体制中存在严重弊病。生产滑坡，技术和智力方面的潜力遭到破坏。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弊病的原因归结为：盖达尔政府过早地放开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价格；罪恶的私有化政策和冒险的财政赤字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专家提出的采取货币主义手段刺激经济和用无法

控制的和匆忙的办法促使俄罗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建议等；世界经济危机仅仅加深了俄罗斯经济的弊病，但不是其产生的原因。

俄罗斯在迈向市场经济中的困难是由于忽视了俄罗斯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千年来形成的民族心理状态。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固然重要，但俄罗斯不应采用别国的处方治自己的病，而应寻找自己的道路。

制约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是：近千年以来，俄国实行的一直是专制统治；独特的自然气候环境曾经并继续严重影响着发展进程；幅员辽阔，各地气候条件差别很大。因此，俄罗斯人历来倾向于寻求国家帮助和支持，倾向于加强国家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缺乏遵守法律的观念，明显地喜好激烈斗争与平静的相互交替，而不喜欢循规蹈矩的耐心细致的日常工作。由此产生了对个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过去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试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客观因素。历史已经证明，不考虑俄罗斯人的心理状态，不考虑新经济思想和新经济行为形成过程中的惰性，俄罗斯改革的“设计师们”都注定要遭到失败。

那么，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挖掘出俄罗斯巨大的潜力，使俄罗斯人民能自行决定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的方式？希望一下子从根本上摧毁原有制度，从而为此创造条件，是行不通的。

在如此强大的惰性作用下，只有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才能够切实达到目的。如果立即用休克疗法使俄国改革前的经济这个“大工厂”停止生产，迫使没有财产的人（即所谓无产阶级）自行谋生，那是不会成功的。相反，如果给这些人创造较好的条件，保证他们获得所期望的消费品，我们反而会较快取得成效。而后必须耐心工作使人们自己采取相应的决定，担负起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未来的责任。必须谨慎地调整经济活动规则，提高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水平，还必须管理好财政和物资的流转。

这些道理很好理解，但没有别的选择。人们已经从实际中了解到，激进的私有化带来了什么后果？造成了所谓的“投机经济”。

在“投机经济”下，尽管生产节节衰退，一半以上的俄罗斯人连工资都无法领到，富人却不断涌现；资本的增长不是按照“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公式，而是按照“货币——犯罪——货币”的循环公式；

天才的科学家、工程师为填饱肚子而不得不到处流浪，或者移居国外，那些化公为私、掠夺国家财富的人却极尽奢华之能事，令世人侧目而视；国家收入基准被有计划地破坏，公民们不得不靠微不足道的国家补贴勉强维持生计。

二、制定明确的改革目标

要弄清实际的趋势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行政管理目标，并不容易，但至关重要。阿·伊·贝尔格院士在阐述行政管理原则时提出3个方面：1. 必须明确目标，确定把行政体制改成什么样和改到什么程度；2. 必须确定和制定运行轨迹，这个轨迹不一定是最佳的，但必须为所有行政管理人员所理解；3. 必须确定沿着这一轨迹运行的速度。

经济改革的速度不能超过国民心理状态的变化速度。因为体制问题涉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每走一步都必须三思而行，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急于求成，即使总的方向正确，目标明确，也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俄罗斯政府在1992—1998年之间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没有搞清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确定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确定目标的第一步，这需要考虑两个制约因素。

第一个制约因素是人口。我们应以多少人口为目标？人口增长过程有很大的惰性。人口数量的变化既取决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史，取决于生态环境、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等状况，更取

决于具体历史时期居民的预期。因而，准确的测算将来人口数并非难事。我们认为，大致为 2 亿人。每个地区都应保持一个合理的人口数量，但用强制手段调节人口是不明智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控制人口趋势中为自由公民创造良好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环境，使最适宜的人口发展成为“被认识了”的必然。”

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结构。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考虑到实现计划所需的资金、资源和民族潜在智力水平。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大致应为 3 万埃居，这大概是今天莫斯科的 5 倍多，俄罗斯的 10 倍。当然，国内生产总值用不同方法评估，结果有所不同。

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应考虑俄罗斯的地域特点和民族心理特性。只有对俄罗斯现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才会是合理的。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和物力，善于协调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资源。

在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还应考虑到俄罗斯拥有生态条件良好的广阔领土的特点。在许多地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气温在零度以下。同时，还必须建立劳动资源、物质资源、财政资源与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其他一些复杂要素的平衡机制。

三、建立合理的经济—法律、社会—政治秩序，以确保改革目标实现

为使 21 世纪的俄罗斯走向繁荣，必须

创造导向繁荣的经济—法律和社会—政治条件，以确保改革目标的实现成为关心自身福利的人们发挥其主动性和进取心的自然结果。

我认为，俄罗斯民族思想正是要建立形成上述条件的国家。建立保护公民权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它必须遵循以下几点。

其一，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的主要内容是为自由公民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税收—法律环境，国家应担负起教育、医疗、保卫以及强制执行的职能等。

其二，在符合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国家里，只有在自由商品竞争和为尽可能多的消费者服务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才能发财致富，其他的致富手段都应加以屏弃，应尽快废除尽管经济衰退但富人仍在增多的经济体制。只有坚定不移地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权，才能为此创造条件。

其三，在符合俄罗斯民族思想的国家里，应该使用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实行对自然资源的深加工，出售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而不是原材料）。但必须强调，不能靠行政命令来实现。为自由生产者创造税收—法律和社会—经济环境本身、社会伦理道德本身应促使自由经营者和自由公民自身这样行动。

其四，不应保留传统的收入体制。那种体制实际上是靠残暴的税收制度从人们手中夺取财富，然后以国家补贴的形式将少部分返还给居民，以支付住房和社会劳

务费用。这种体制完全破坏了提高效益的竞争激励机制，财富在从公民到公民的流动过程中经过国家官僚之手造成大量流失。而且，人对国家的这种依赖性使人的尊严受到伤害。

其五，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应按全面的伙伴关系原则组织起来。对立的思想意识应代之以互利的思想意识。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应如此。

四、改革要想为人民所理解，必须注重实际成效

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难道俄罗斯人民又要参加实现一个只能“注定要失败”的改革方案吗？我们还必须实现能尽快达到目的并获得回报的目标，正如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和列宁共青团汽车厂已经做到的那样。在泽列诺格勒，高科技产品的年增长率达到 30%。

国家应广泛地尽快使大量闲置的、有待开发的资源运作起来。考虑到俄罗斯市场的巨大容量和政府的支持，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满足相当一部分居民的需要。适当地出口一些自然资源是可以允许的，但出口所获资金应用来提高生产工艺水平。

俄罗斯与国外的专家开展空间技术合作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许多技术决策、工艺、国防和空间技术产品等领域仍未失去优势。通过使这些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我们可以改善这些企业工作人员的精神状

态，从而获得新的成果。

我们还可以用公平分配资源和地块的级差地租的办法较快地提高公民福利水平。这样做，一些部门（主要是销售部门）利益有可能受损，问题是，它们目前的收益就是不合理的，有些销售部门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攫取了大量超额利润。而且，从长远看，他们是我们的潜在盟友。因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资源价格的提高，他们遭到的损失都将得到巨大的补偿。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必须尽快恢复机会均等原则，无论开展企业活动、教育、医疗服务，都必须如此。不能借口资金不足而不这样做。只要人们切实从事生产活动，只要杜绝对全民财产的任何盗窃的可能，就会得到充足的资金。因此，莫斯科市政府坚决制止教育转向商业化。

近来，除了人所共知的消极现象，我们还看到一些令人乐观的迹象。我指的是运用较为批判的态度看待外国的建议，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排除教条自由主义和教条货币主义拥护者的干扰，在为人民的利益建设国家的进程中积极吸收俄罗斯学者和进步国务活动家参与。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那些西方经济学家的信徒们在俄罗斯造成的混乱局面定会有所改观。

（责任编辑 李兴耕）